

從蔣渭水〈臨床講義〉到曾貴海〈二十一世紀 臨床講義〉的瀏覽

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簡銘宏

摘要

明治 31 年（西元 1898）台灣總督府聘請後藤新平擔任民政長官後，透過新式醫院的設立及其醫療教育體系的推展，除了儲備台灣近代醫學所需要的專業人才來源外，因為醫學教育體制的訓練而接觸到世界的先進思潮，同時造就了思考台灣民族自身命運與未來的知識份子，如蔣渭水與賴和等人。這是近代醫學教育具備科學知識與思維辯證的多樣性影響。大正年間，為了擺脫當時台灣總督府的同化主義，確定帝國殖民鬥爭下台灣社會的生存之道，蔣渭水撰寫了〈臨床講義〉一文，對傳統民族體質的缺陷或弊害大加批判，並提出個人的改造策略與具體作為。

隨著歷史時間的前進，資訊產業的蓬勃發展與教育傳播體系的完備，西元 2007 年的台灣社會似乎已達到了蔣渭水個人期盼的政治藍圖和理想目標。然而，醫學教育啟蒙的獨立思考與分析能力，使得曾貴海超越普羅大眾的短視膚淺和盲從，以銳利的眼光看穿全球化浪潮下的文化複製危機。透過強化台灣的主體性意識型態，他撰寫了〈台灣新文化宣言〉、〈二十一世紀臨床講義〉，同樣地，也提出一套改造民族體質的具體方案與論述。

蔣渭水與曾貴海，這兩位新式醫學教育薰陶下的知識份子，同樣秉持關切台灣社會未來前途的初衷和熱情，藉由論述寫作與社會運動，進而具體實踐個人的政治理念和意圖。固然，從文學的觀點來看，文學文本的語義和語境，隨著不同的歷史文本，在表徵的體現上，會有所差異。但是，蔣渭水〈臨床講義〉和曾貴海〈二十一世紀臨床講義〉，診斷和治療台灣這位病患身體的過程中，他們所使用的語言符號，各有精彩而獨特的文學文本，值得當代讀者細膩地閱讀，並進一步地思考文本背後所代表的社會時代意義。

關鍵字：蔣渭水、曾貴海、臨床講義、台灣

一、前言

西元 2007 年 10 月 17 日，在文建會舉辦「台灣文化日」的開幕儀式上，曾貴海先生〔以下內文，略省稱謂，無不敬之意〕代表民間文化社團和文化工作者，擬定並宣讀一份〈台灣新文化宣言〉，作為台灣文化界對台灣文化協會成立 86 年後的歷史省思和回應。¹曾貴海認為，台灣文化協會對台灣文化的奠基與發展的過程中，扮演先行者的歷史性里程碑，萌芽了台灣文化的主體意識。這是台灣歷史上最具有影響力與全面性的現代化啟蒙運動，為台灣移民社會確立了台灣主體性文化思想的基礎。²回溯日治時期大正 10 年（西元 1921）10 月 17 日，在日本統治者眼中，當時台灣島內「運動的先驅者，為團體組織而奔走」³的台北市開業醫生蔣渭水，起草了〈臺灣文化協會趣意書〉一文，說明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的主旨。這份主旨的部份文字，正呼應上述曾貴海對於台灣文化協會意義與價值的認知：

慎重思考當今的文明是物質萬能的文明。現在的思潮是混沌險惡的情勢。最近的趨勢是建設改造之秋。然而，我臺灣位於帝國的南端、孤懸在海外。因此，經常跟不上世界的潮流。⁴

同時，蔣渭水更進一步地引用林子平的談話「日本的海水通達歐美」，說明日本帝國南端位置的台灣，不僅海峽的自然地理關係維持著四面八方的船舶來往通行的要道，在時間的進程上，遲早也是世界思潮的匯流地方。⁵誠如曾貴海所說的，台灣文化協會確實推動了台灣社會一股「全面性的現代化啟蒙運動」。

不過，當時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大會，並不只有台灣社會賢達、知識青年與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學生的參與，同時還有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的高木友枝校長、堀內次雄博士、田川高等普通學校校長、北署長、萬華分署長等主持台灣教育界及警務方面的日本「內地人」。所以，蔣渭水在台灣文化協會發行的《會報》第一號發表了〈台灣文化協會創立經過報告〉，就說明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動機：

這裡，在報告文化協會創立經過之前，我想要說一些關於本會創設的動機。說來話長，因為現在所謂的台灣人，是○○民族，同時也是日本國民，所以

¹ 曾貴海：〈回應蔣渭水，形塑新文化〉，《台灣文化臨床講義》（高雄：春暉出版社，2011），頁 1。

² 同前註。

³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文化協會の創立〉，《臺灣社會運動史》（東京都：龍溪書舍，1973），

復刻版，頁 138。（原書為《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昭和 14 年）

⁴ 同前註，頁 138-139。

⁵ 同前註，頁 139。

台灣人生來就帶著連繫與媒介日華親善的使命了！⁶

至少大正 10 年 10 月 17 日的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大會上，蔣渭水似乎已經清楚說明當時「所謂的台灣人，是○○〔按：○○為中華〕民族，也是日本國民」。這段描述當時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彷彿與曾貴海認知台灣文化協會具備「萌芽了台灣文化的主體意識」的話語，感覺有些距離，並且缺乏了文化抵抗的意識，反而多了一些妥協與屈從的工具性意味。這似乎好像也印證了，實際負責執行台灣文化協會的專務理事蔣渭水，在協會成立之初，就向台灣總督府當時執行思想言論管制取締的機關首長川崎警務局長保證，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僅僅只是為謀求台灣文化的提昇，未來的一切作為與政治運動無關。⁷

然而，再深入研讀蔣渭水同樣發表在《會報》第一號的〈臨床講義〉，即能明白〈臨床講義〉內文中的語言符號，面對當時言論與出版審核管制的嚴苛情況下，作者總會透過一種協商（negotiation）的機制，⁸進行寫作的抵抗策略。此為殖民話語中的一種擬仿過程裡，利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共有話語的重疊部份，產生既妥協又對抗的雙重力道，實際上是進行文化抵抗策略的偽裝術。蔣渭水〈臨床講義〉透過這種協商機制，進行細膩的辯析與論述，建構了語言符號在歷史文本與文學文本之間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結果。⁹

不過，隨著歷史時間進程的推移，在昭和 20 年（西元 1945）裕仁天皇發簽署了〈大東亞戰爭終結ノ詔書〉〔即終戰詔書〕後，台灣社會開始進入中華民國政府的接收與治理時期。按理來說，此時台灣的政治體制再度獲得轉向的契機，已經符合了〈臨床講義〉「原籍」條例下的預設目標「中華民國」，最終達到了蔣渭水個人期盼甚久的政治理想。可是，到了西元 2007 年的歲末，出身與蔣渭水相同的開業醫師背景，並且一樣關心台灣未來前途的曾貴海，為何仍然發表了〈台灣新文化宣言〉及〈二十一世紀臨床講義〉，想要替當今的台灣社會診斷弊病並提出改革藥方呢？

換句話說，相異的歷史文本所形構的〈臨床講義〉及〈二十一世紀臨床講義〉，由不同時空下的兩位作者，藉著類似的臨床診斷書格式，分別為台灣社會診斷病態的所在，以及開立改善體質的處方藥箋。這兩份環境背景差異下的〈臨床講義〉及〈二十一世紀臨床講義〉，從文化抵抗的寫作策略與台灣文化的主體性意識等面向來看，兩篇內文的語言符號上，究竟有什麼樣的表徵（representation）與意義呢？這是本文論述的重點。

⁶ 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臺北：海峽學術，2005），下冊，增訂版，頁 696。

⁷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文化協會の創立〉，《臺灣社會運動史》，頁 139。

⁸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25。

⁹ 詳細的論述過程，可參閱簡銘宏：〈蔣渭水〈臨床講義〉的一種觀看〉，《台灣文學研究學報》（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04），第 16 期，頁 167—213；簡銘宏：〈臺灣近代醫學凝視下的〈臨床講義〉〉，《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學報》（屏東：國立屏東教育大學，2012.09），第 39 期，頁 57—92。